

漂浮的孤魂——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劇

文·圖片提供／邱坤良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）



▲日治時期的新劇團為響應皇民化運動製作的海報。

臺灣戲劇從明鄭與清初移墾時期開端，歷經清代中晚期、日治、戰後初期的發展，以至當代。其中日治時期不僅受日本戲劇影響，亦銜接十九世紀末來自西方的文藝思潮與近代社會文明，在戲劇形式與內容上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。

二〇年代初期殖民地的臺灣與日本「內地」之間交通頻繁，許多臺灣精英至日本求學、旅遊，接觸當地的戲劇教育與劇場活動，成為推動臺灣新劇的重要動力；另一方面，在中國的若干臺灣人也受廈門通俗教育社的啟發，回臺推動新劇運動，其中包括許多無政府主義者。而在臺灣的日本人（約占臺灣人口十分

之一），也不乏組織劇團、投入新劇運動者，這幾股組合構成日治臺灣新劇運動初期的主力，而後逐漸擴展到工農團體與地方仕紳。

當時的新劇團缺乏專業編導演，「同仁」性質濃厚，觀眾也多屬關心殖民地文化前途的有心人。劇團之間分分合合，存在的時間皆不長。以新劇運動先驅張維賢而言，他所創立或主導的劇團有星光演劇研究會、民烽劇團（含民烽演劇研究所）、宜蘭民烽劇團，每一個劇團的壽命都不超過五年。張維賢之外，其他新劇人士或新劇團更無「歷史」可言。

除了戲劇專業人才不足，作

為劇場重要元素的文本書寫、舞臺語言，也影響臺灣新劇發展。當時臺灣人的新劇團體多採用日文文本，少數用漢文，但舞臺語言則多用臺語，此因觀眾多為臺灣人，日語程度參差不齊，演員也非人人精通日語。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，連張維賢所推出的新劇也以臺語為主，即使1934年2月下旬參加臺北劇團協會的新劇祭，在以日本觀眾為主的「榮座」演出《新郎》時，依然使用臺語，因為「若用日語演出，現有的民烽團員，需費很多時間，恐怕尚不易演好。」

然而，劇場以臺語做舞臺語言並不容易，源自閩南各地臺語的口音，隨著移墾過程的族群混雜，堪稱南腔北調。劇本創作尤其困難，不僅不易以臺語直接書寫，演員也很難根據文本精準的念出臺詞。語言既受限制，劇場效果難免受到影響。

三〇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，臺灣殖民地政府加緊限制臺灣人民思想與言論，中日戰爭爆發，皇民化運動全面推動，臺灣戲劇也全面走向新劇化、日本化。臺灣演劇協會成立後，要求所有臺灣劇團用日語演出，但在登記有案的五十個左右的劇團中，能完全使用日語者只有五六團。

當時的新劇受政治環境影響，坎坷多難，生存空間受到限制。除



▲臺灣新劇第一人——張維賢（中）。

了「純棉」的新劇團，戰時的新劇團有些是由歌仔戲劇團改裝而成，加上一些日本地方劇團導演、演員應聘來臺指導、演出的日本新劇，臺灣新劇舞臺風格更加混亂。臺灣演劇協會曾將日語演出能力不足的劇團予以分級，安排訓練課程「鍊成」。然而，還未看到成果，日本已戰敗投降。

綜觀日治時期臺灣主導的新劇運動，充滿社會改革與劇場藝術理念。不過，多屬於理念層次，缺少舞臺實踐的過程與成果。張維賢堪稱臺灣新劇代表人物，其在民烽劇團成立的宣言云：「處今之世，如何諒解並關懷人生，並揭露那御用藝術的黑暗，是我們要努力以赴的目標。本劇團同仁，對聲稱不關心藝術的社會大眾，大聲呼籲，請儘速參加為藝術而藝術的團體，協心合力完成我們對藝術的神聖使命。」既要關懷人生，揭露御用藝術的黑暗，又標榜為藝術而藝術，如何實踐，並沒有清楚的策略與路線。戰時，林博秋、王井泉等人成立厚生演劇研究會，並籌備演出《閩雞》等劇時，也有

「第二次新劇運動」之說，充滿浪漫的熱情，然而言猶在耳，熱情尚未綻放，臺灣社會已天旋地轉，由另一個政權重新開始。

從臺灣歷史與戲劇史的脈絡來看，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劇運動在時間上可延

伸到戰後的兩、三年，但整個活動力與影響，卻被限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空環境中，缺乏承先啓後的發展脈絡。從日本帝國手中接管臺灣的國民政府施政重點，在於去日本化、再中國化。檢視臺灣這一段被殖民的歷史，及其發展的文學、藝術活動，皆以反殖民、反壓迫作為論述的基礎，走過日本時代的臺灣新劇運動人士依然受到宰制，日治時期的新劇成為消失的舞臺印象。在中國來臺戲劇界人士主導的現代劇場，臺灣新劇運動人士所能發揮的舞臺空間有限，甚至淪為戲劇邊緣人，如張維賢在日治時期所謂的孤魂——生前孤獨，死後仍無依靠的可憐靈魂。



▲新劇《阿里山》的導演林博秋。

日治時期的臺灣新劇繁雜多變，品類不一，單從報刊或文獻出現的新劇團名單及其演出活動，容易產生臺灣新劇蓬勃發展的假相。這些資料與論述能否反映日治時期臺灣新劇的全貌，值得觀察與研究。近二十年，日治時期的新劇隨著臺灣戲劇研究風氣的普及而受到更多關注，值得慶幸。然而，有關劇本創作詮釋、導演手法與演員表演方式的研究或記錄極為少見。當時的日文、漢文報紙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臺灣民報》（後改組成臺灣新民報）或後來的《臺灣新聞》、《興南新聞》以及若干雜誌所刊登的新劇文章，也多屬介紹或鼓勵性質。

基於新劇理念與舞臺實踐之間的差距，日治時期的新劇資料需做進一步理解。當時的戲劇新聞報導或官方機關出版品，以及藝文作家的親身經歷——包括當時的論述或光復後的追憶，是否前後不同，也有再觀察的必要。否則，因理解與詮釋的不同，容易對日治時期的新劇運動或相關資料產生擴大解讀的缺失。



▲演劇挺身隊演出情形。